

中日关系 研究的新思考

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马兴国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序

刘德有

在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开展中国东北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东北地区南濒黄海、渤海,与日本隔海相望。据考古学家分析,日本列岛原与东亚大陆相连,后被海水分开。但在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当海面因冰期来临下降时,列岛又多次通过“陆桥”与大陆相连。直至距今1万年前的全新世之初,由于海面回升、地壳变动,方使日本与大陆完全分离。

相邻的地理位置,为东亚大陆与日本的交往提供了方便。据信,中日之间最原始的自然航路就是由东北经由朝鲜半岛东南部沿岸,顺海流抵达日本本州的山阴、北陆地区的。其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进文明源源传入日本。

我国东北历来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安居乐业之地。公元713年,唐玄宗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去靺鞨

之号，专称渤海，此渤海国即是以靺鞨粟末部为主体，结合其他靺鞨诸部，以今牡丹江上游敦化——宁安为中心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其王由唐帝册封，其国按唐制建立政治经济制度，其使臣年年朝唐入贡，其文化与唐“本一家”。

渤海与日本交往频繁。其先民移居日本当远远早于中原华夏诸族。自开元十五年(727年)，渤海王大武艺以高仁义为大使出访日本，至渤海亡国前的五代后梁贞明五年(919年)的前后凡192年间，渤海聘日34次，日本聘渤海14次，双方共交聘48次，平均每4年即有使团往来1次，较唐日交聘既多且密，极大地促进了唐代东北地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9世纪中叶以后，唐朝中央政府与日本朝廷官方交往稀疏之时，渤海作为唐王朝的地方封国，与日本依然保持密切联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是中国东北与日本文化交流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回顾中国东北与日本友好往来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忘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侵略也是历史：1894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又在我国东北发动了同俄国争夺远东霸权的日俄战争；1931年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进而又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半个多世纪中，东北在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九·一八”事变以后，则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反侵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法西斯的野蛮统治，使东北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就文学而言，由于日本当局拼命鼓吹和扶植封建法西斯文学、粉饰文学，使东北近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特殊的基础和特殊的思想文化资料。同时也导致中国东北近现代文学史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日关系史研

究更加错综复杂；抗战文学、进步文学、乡土文学、汉奸文学、殖民文学，乃至日本学者提出的开拓文学等等，良莠相杂。但是，也有有良识的日本作家在中国东北写下了一些有益于人民之间友好的作品；东北沦陷时期的部分作家，也在艰难的环境中，从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外文学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只要我们不畏辛劳地调查整理，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肯定会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及本质，做出科学的、公正的结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将一小撮军国主义元凶和广大日本人民严格区别开来，为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和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日关系展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东北人民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与日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往来。为适应多极化格局的世界经济新时代，开展了包括中国东北、日本列岛在内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使东北亚区域成为充满希望和发展的地区。日本是东北亚地区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在工业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方面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日本正在加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进程，意欲向海外转移一部分传统产业，加强直接投资，寻求新的燃料市场，不断扩大商品市场，为此需要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中国的东北，尤其是辽东半岛对外开放地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交通条件、良好的资源储备，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实力，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是东北亚区域国际分工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区域。可以预见，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完全可以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为21世纪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做出贡献。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是我国成立较早的综合性日本研究机

构。近三十年来,他们在日本政治、历史、文化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以及与日本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该所又举办了“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聚集一堂,就渤海与日本的通交、中国东北近现代文学与日本近现代文学、东北亚经济圈与辽东半岛开发等课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取得共识。我认为,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由总体到局部,乃至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是中日关系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思考。

研讨会主办单位曾邀我出席,但因种种事情,终未能成行。现在,兴国同志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请我写些文字,盛情难却,谨撰此文以表对“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的祝贺;对东北地区日本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的期待,并代序。

1992年10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刘德有
---------	-----

历史篇:渤海与日本的友好往来研究

古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交往	孙玉良(1)
渤海日本邦交的战略意识	王金林(14)
渤日交聘与八、九世纪东亚国际关系	任鸿章(27)
渤日通交在唐代中日友好交流史上的地位	马依弘(41)
北沃沮人东渡日本考	王 侠(54)
日本国灵仙三藏和渤海国贞素和尚	王承礼、李亚泉(62)
两乡何异照 四海是同家 ——渤海日本往来诗探微	马兴国(70)

文学篇:中国东北近现代文学与日本近代文学研究

近代中国东北与“昭和”文学 ——关于研究的基本要因	铃木贞美(89)
石桥湛山与反战文化	易显石(102)
简论大连地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诗词歌谣	田久川(117)

关于昭和时期的一个知识分子山本实彦的生涯

- 以《改造》杂志为中心…………… 萩野修二(141)
- 关于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 梁山丁(156)
- 友谊的回忆…………… 秋 萤(162)
- 阶级抗争图 乡土风俗画

——梁山丁和他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 王建中(173)

绽开在地狱层的花朵

——王秋萤和他的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 刘树声(188)

万宝山事件与《万宝山》

- 评伊藤永之介的短篇小说《万宝山》…………… 李弘慧(197)
- “满洲”与“开拓文学”…………… 日高昭二(206)
- 日本作家笔下的大连…………… 刘立善(223)
- 战前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作家作品分析…………… 平献明(238)
- 伪满洲国的日本奴化教育…………… 李全毅(253)

经济篇：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中日经济关系研究

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兼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日本…………… 金明善(262)
- 东北亚经济合作与独联体…………… 土屋昌也(282)
-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中国东北同日本的经济交流

- …………… 余炳雕(296)
- 东北亚经济合作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 麦丽臣(310)
- 东北亚经济合作与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蔡明哲(327)
-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几个问题…………… 张贤淳(338)
- 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中日经济的关系…………… 闫 莉(349)
- 中日经济关系及辽宁与日本的经济合作…………… 刘昌黎(360)
- 辽东半岛与日本在东北亚地区发展战略的关系…………… 徐 平(369)
- 辽东半岛的外资利用与日本…………… 金 颖(380)

辽宁对日经贸商交的法律问题探讨

.....	邱 生 周世花 王月秋	(391)
日本东亚经济战略的抉择.....	宋绍英	(404)
日本“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战略及其发展形态.....	孙世春	(414)
论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地位、作用与展望 ...	张善儒	(428)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日本的地位和作用.....	贾宝波	(439)
渤海、日本通聘年表		(459)
编 后	马兴国	(470)

古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交往

孙玉良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尤以东北地区距日本最近。特别是在较早的古代，其北端的库页岛，几与日本北部之北海道岛对接。因此，自古代中日两国交往之日起，东北就与日本有了接触，成为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篇章。对此一问题的探讨，无疑会有助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中日交往的全过程，准确勾画出两国交往的轨迹，把握住未来的方向。

在以往有关中日关系史的各家著述中，对古代东北与日本的交往很少载笔，抑或论述不足，很难了解中日关系史的全貌。本文仅就唐及其以前，东北与日本之交往，略作叙述，起一点拾遗补缺作用。

唐代以前东北与日本的交往

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的交往，究竟起于何时，目前尚难得出确切结论。依据日本现代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大约在两千数百年前，

中国文化即已开始逐渐传播到日本，而这种传播的途径，除了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传入以外，更主要的还是通过两国人员直接交往而实现的。由于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互相往来，必须渡过波涛浩淼的大海。尽管北端的库页岛与北海道岛近在咫尺，但因陆路多山，行程遥远，反不如南部渡海方便。现已探明，自古以来，位于日本西部和中国东北东部之间的日本海中，有一道按逆时针方向流动的环流。此一环流，可以将双方的船只，自然漂浮到彼岸。在古代航海术极原始状况下，日本海环流犹如为双方往来架起一座天然桥梁，特别是为东北与日本的直接交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据中国古文献记载，中国自殷周以来，由于战乱灾祸等原因，许多人为了躲避灾难，谋求生存，远走他乡，流入各地，其中有些人很可能到了日本。而日本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期以后，积极吸收中国文化，不断寻求同中国各地交往。从发展趋势而言，双方之交往，当是自发的民间交往在前，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官方交往；在官方交往出现以后，仍存在着民间的交往。古代东北地区，曾出现过一些地方割据政权，有的割据政权出现以后，为了发展自己，扩大对外部影响，也积极谋求同日本的交往。又由于这些割据政权不断更替灭亡，双方的交往时续时断，缺少连续性和持久性，影响了双方长期合作与共同发展。据文献记载，在唐代以前，东北与日本的交往，主要体现在战国后期至秦汉时的燕国、汉魏时的公孙氏政权、汉至唐的高句丽、南北朝至唐的靺鞨部等。

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马端临，在他著名的《文献通考》一书中，称“倭人自后汉始通中国”，“其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卷324《四夷考》）。马氏此论，有得有失。其始通时间，似嫌过迟；初通实自辽东而来，则颇合客观实际。马氏纂辑此书，虽然

是以固有文献为蓝本，言必有据，史必有证，但也恐难免会有疏漏或讹误。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中，有这样一则记载：“盖国在钺燕南、倭北，倭属燕”（第十二《海内北经》）。倭是日本的古国名。燕是周朝的诸侯国，始建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后期，位于今日北京市周围。据金毓黻先生考证，至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前后，燕将秦开率兵北却东胡千余里，东取古朝鲜之地二千余里，使燕国势力从今日北京市一带，延伸到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中部地区，并始设辽东、辽西等郡（见《东北通史》第一期三）。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即燕僖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天下归一。《山海经》一书，历来被确认为信史，所载“倭属燕”，若确有其事，其时间断限，当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22年之间，即为燕领有东北地区时，而东北自然成为双方交往必经之地。同时，东北与日本交往的起始时间，也当定于此时为宜。

秦及西汉时期，古籍中未留下东北与日本交往的纪事，难以确论。到了东汉末叶，才见诸文字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辽东太守公孙度乘汉室衰微，中原板荡，自立为辽东侯，坐镇襄平（今辽阳市），割据一方，前后祖孙三世，历时五十年，执掌东北地方大权。并将势力深入到朝鲜半岛，领有乐浪郡。随后又分乐浪郡南部之地置带方郡，责成带方郡处理与日本交往有关事宜。据《三国志》载，倭国使者常诣魏京城及带方郡，而带方郡也常出使倭国，负责传送文书，赠送礼物（卷30《倭人传》）。这些纪事，虽很简单，缺少具体史实，但却可说明，割据东北的公孙氏政权，同日本有过正式交往，并成为魏与日本交往的一部分。

自西汉后期，至唐朝前期，东北地区曾存在过一个高句丽民族政权。这个政权，兴起于今日辽宁桓仁县及吉林集安市一带，其地域是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一部分，其民族是古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历史当属中国史范畴的一章一节。他同汉代的夫余、

原书缺页

年)，高句丽迁都平壤，统治中心南移，同日本交往日趋增多。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七年（高句丽西川王七年、公元276年）秋九月，高句丽曾遣使日本，进行友好访问。三十七年（高句丽美川王七年、公元306年）春二月，日本遣阿知使主等出使西晋，向晋求取女缝工匠人，途经高句丽。但阿知使主等不知通往西晋道路，请求高句丽派向导带路，得到应允。于是美川王派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其导者，使其顺利到达西晋，晋送与日本四名女缝工（卷10。原文晋作吴，但在280年，晋已灭吴）。从上述情实得知，当时高句丽不仅与日本交往，而且还是日本与魏晋交往的桥梁，仰赖于高句丽的支持与合作。双方在初期交往过程中，高句丽文化即已传到了日本。《日本书纪》卷十一载，仁德天皇十二年（高句丽美川王二十五年、公元324年）秋七月，高句丽将铁盾、铁的传到日本。八月，仁德天皇宴请高句丽客人，命日本群臣“射高句丽所献之铁盾、的，诸人不得射通的。”引为双方友好交往的佳话。

至高句丽广开土王时，是高句丽向外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倭兵大举入侵新罗、百济，直接威胁到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既得利益，广开土王曾两次出兵击败倭寇。据《好太王碑》留下的记载，广开土王十年（400年），“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倭寇大溃”。这是高句丽与日本首次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并以日本失败而告终。广开土王十四年，高句丽再次与倭寇较量。当时，由于倭寇串通百济，侵入带方境内，高句丽受到直接威胁，于是广开土王“躬率往讨”，亲临战阵。结果，倭寇溃败，“斩杀无数”。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历史事件，广开土王这次抗倭斗争，既是东北人民抗倭斗争的开端，又是中朝两国人民携手抗敌，并肩战斗历史的开始，对后世中朝日三方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影响。

自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至668年唐灭高句丽，高句丽地域横跨鸭绿江两岸。在此期间，高句丽与日本的交往，既是古代东

北与日本的交往，也是古代朝鲜与日本的交往。为避免引起歧意，故本文略而不述。

南北朝至唐代，肃慎族的后裔靺鞨族，居住在东北的东部和北部的广阔地区，直接同日本隔海相望，双方时有往来。在日本古籍中，往往仍称靺鞨人为肃慎人。据《日本书纪》卷十九记载，钦明天皇五年（544年）十二月，“越国言：於佐渡岛北御名部之碕岸有肃慎人，乘一船舶而淹留，春夏捕鱼充食。”又云：“肃慎人移就濑波河浦，浦神严忌，人不敢近。渴饮其水，死者且半，骨积如岩岫，俗呼肃慎隈也。”此两则纪事，说明当时生活在东北的靺鞨人，每当春夏季节，常到日本海中捕鱼为食，并时常在日本沿海岛屿中停留，直接与日本人进行交往，逐渐有成批靺鞨人移居日本，⁴溶入日本民族中。

至唐朝前期，东北的靺鞨人与日本有了进一步交往。而这些交往，基本上是日本人常到靺鞨人中进行骚扰。日本自孝德天皇于645年即位以后，经过“大化革新”，积极吸收中国文化，革新政治，使日本走向盛强之路，并试图向外发展。而此时东北靺鞨各部，也有飞跃性的发展，纷纷形成强大的群体，足可以与外来势力相抗击。据《日本书纪》卷十六载，齐明天皇四年（658年），“越国守阿部引田臣比罗夫讨肃慎，献生熊二、熊皮七十枚。”纪中的所谓“讨肃慎”，应视为掠夺性的骚扰，所献之物，为从靺鞨人手里掠去的特产。并由此可知，此次讨肃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掠夺财物，以献给天皇和中饱私囊。至齐明天皇六年（660年）三月，又“遣阿倍臣率船师二百艘，伐肃慎国。……肃慎乃陈船师，系羽于木，举而为旗，齐棹近来，停于浅处。……阿倍臣遣数船使唤，不肯来。复于弊路弁岛，食顷乞和，遂不肯听，据已栅战。于时能登臣马身龙为敌被杀，犹战未倦之间，贼破杀己妻子。”应该说这是双方发生一次海战，并以日本失败告终。由此说明，东北先民素有勇武善战、不畏强敌精神。同年五月，阿倍引

田臣“于石上池边作须弥山，高如庙塔，以飨肃慎四十七人。”动武不成，转而睦邻友好。此受飨之肃慎人，应是靺鞨族赴日本的使节，受到了日本隆重友好接待。至天武天皇五年（676年）十一月，“肃慎七人从清平等至之”（《日本书纪》卷29），靺鞨与日本继续友好往来。“从清平等至之”，即表明清平等是从靺鞨人中归来，而靺鞨人随从清平访问日本。持统天皇八年（694年）正月，“以务广肆等位，授大唐七人与肃慎二人”（《日本书纪》卷30），仍是日本对靺鞨的友好表示，也是靺鞨人首次获得日本给予的殊荣。十年（696年）三月，又赐“肃慎志良守靺草、锦袍袴、绯、绀、纁、斧等”礼物。以上纪事，说明日本与东北靺鞨族曾有过广泛的交往，并为后来渤海国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

唐代渤海与日本的交往

唐代是中国东北与日本交往最频繁时期之一。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以粟末靺鞨部为核心，在今日吉林敦化市一带称王立国。随后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改称渤海国，使东北进入崭新开发时期。随着渤海政权的巩固和强大，积极开展对日本的交往，频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彼此建立起非常友好的睦邻关系。正如渤海赴日本大使乌须弗所言：“渤海日本，久来邻好，往来朝聘，如兄如弟”（《续日本纪》卷32）。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原则，持续友好了二百余年。

渤海与日本交往的历史，主要是载记于日本古籍之中。在现存的日本古籍中，有二十余种书籍，载有数百条双方交往的纪事，累积达五万余字，为揭示双方友好交往的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以往中外史学界，对渤海与日本的交往多有论述，意见

也较为接近，本文不再重复。唯在枝节末端，略作点补充，以抒一孔之见。

有许多学者，根据《续日本纪》卷十所载，将日本圣武天皇神龟四年（渤海武王仁安九年、公元727年），武王大武艺遣渤海宁远将军高仁义、首领高齐德等二十四人出使日本，视为双方通聘之开始。但是，同书卷八又载，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春正月丙子，“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此时上距渤海立国已有二十二年，而距大祚荣“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新唐书·渤海传》卷219）只有七年。因此纪中的靺鞨国，当是渤海的俗称。同时，渤海国是当时靺鞨诸部最大的政权组织，旧时其东部的白山靺鞨等部，自唐灭高句丽后，“部众多入中国”，纷纷“奔散微弱，后天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旧唐书·靺鞨传》卷199下）。再者诸君鞍男从日京至靺鞨国路线，既应与昔日同靺鞨交往的路线相联系，又应与后来渤海通往日本的日本道有关。因此，可以推断诸君鞍男等所到之靺鞨国，当是渤海国。如果此一推断不误，那么，诸君鞍男等是第一批到达渤海的日本使者，是双方友好交往正式开始，而渤海高齐德等二十四人出使日本，是在日本遣使渤海之后，并非双方友好交往的开端。此次日本遣使目的，仅是观其风俗，带有考察性质，是一次试探性的交往，为将来的交往铺平道路。

据《帝王编年记》卷十一记载，圣武天皇神龟三年（726年）十二月，“渤海朝贡”。此则纪事，《续日本纪》未载。考于神龟四年渤海出使日本的纪事，在圣武天皇致武王的国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首领高齐德等还次，……仍差送使，发遣归乡”（《续日本纪》卷10）。仍差送使，即照旧派遣送使之意，如果不是望文生训，由一个“仍”字，便可断定在神龟四年以前，渤海曾遣使日本，而且使臣归国时，日本差送使护送。那么，《帝王编年记》所载渤海朝贡的纪事，不当以错简或误记视之。此一判断如果不误，

那么，727 年大武艺遣使日本，也不是渤海出使日本的开端。

在渤海三十余次遣使日本中，各次人数多寡不一。据所记载下来的各次使团人数，初期为二十余人或几十人。至文王大钦茂时，使团人数曾猛增至三百五十九人。随后又降至六十人左右。至宣王建兴六年（823 年），又增至百人以上。从大虔晃四年（860 年）起，每次均为一百零五人，成为衡式。而日本历次赴渤海使团人数，古籍中只留下三次具体记载。一是圣武天皇神龟五年（728 年），以引田虫麻吕为首的六十二人；二是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 年），以小野田守为首的六十八人；三是天平宝字三年，以高元度为首的九十九人。双方每次使团人数为何如此庞大，有必要作一点具体分析。据现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收藏之渤海大彝震咸和十一年（841 年），渤海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文载录，此次使团人数为一百零五人，其职司分别为：使头（大使）一人，副使（副大使）一人，判官二人，录事三人，天文生一人，大首领六十五人，梢工二十八人。与日本赴渤海使团人员组成相比，大同小异。据《延喜式》卷三十载，日本入渤海使团，除大使、副使、判官、录事、译语外，其余尚有主神、阴阳师、史生、船师、射手、卜部、杂使、船工、柁师、谦人、挟抄、水手，共十八种职别，分工比较专业化。如渤海的船工，统称为梢工，而日本则分为船师、船工、柁师、挟抄、水手五类。自古以来，国与国的交往人员，很讲求对等原则，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双方使团人数之所以庞大，主要是因为护卫人员和船工需人较多。在 841 年，渤海一百零五人的使团中，有六十五人是大使，占总人数的 61.9%。据王承礼先生推论，“这是渤海的地方政治势力的代表，可能是代表六十二州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渤海简史》第 156 页），可备一说。但是，从日本使团人员构成上，又得到另一方面启示，内中有射手一职，即护卫人员。考虑到当时来往船双，常常因遭遇风浪袭击，漂流到一些荒僻岛屿上，受到野蛮人